



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

吴航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吴航，1978年生，河南信阳人。历史学博士。现任淮北师范大学校聘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开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明清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和研究。目前在《文献》《史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图书馆理论与实践》《西南古籍研究》《安徽文献研究集刊》等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全国高校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潘耒诗文集〉辑校》等科研项目。



清代南明史撰述，是记载明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之后在南方相继而起的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等南明政权与人民群众抗清斗争的官私撰述群体，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特殊的史学现象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史学上如何处理王朝更迭历史的突出代表之一。本书征引大量文献，以清代官私南明史撰述为核心，着重探讨官方史学政策之嬗变、官方南明史撰述的特点及影响，以及私家南明史撰述的发展演变、学术成就等重要史学问题。旨在探究清代官私南明史撰述的学术成就及密切关联，以期深入阐明清代南明史撰述的学术价值、学术地位诸问题。

责任编辑 马晓雪
特约编辑 王若濛
装帧设计 汤磊

ISBN 978-7-201-09344-4



9 787201 093444 >

定价：79.00元



清代南明史撰述，是记载明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之后在南方相继而起的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等南明政权与人民群众抗清斗争的官私撰述群体，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特殊的史学现象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史学上如何处理王朝更迭历史的突出代表之一。本书征引大量文献，以清代官私南明史撰述为核心，着重探讨官方史学政策之嬗变、官方南明史撰述的特点及影响，以及私家南明史撰述的发展演变、学术成就等重要史学问题。旨在探究清代官私南明史撰述的学术成就及密切关联，以期深入阐明清代南明史撰述的学术价值、学术地位诸问题。

责任编辑 马晓雪
特约编辑 王若濛
装帧设计 汤磊

ISBN 978-7-201-09344-4



9 787201 093444 >

定价：79.00元

引 言

一、选题范围及意义

明清之际，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个大变革、大动荡时代。前有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推翻了朱明王朝近二百八十年的统治，当时学者称之为“天崩地坼”；继有满族统治者以“夷族”，乘机入主中原，定鼎北京。而南方相继建立的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等南明政权，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逐一土崩瓦解。清朝建立了以满族统治者为核心的满汉联合专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整个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人们一般将明末清初这段特殊的历史，称为“南明史”。

按照顾炎武的说法：“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①在汉族士大夫学者眼里，大顺政权倾覆明朝社稷，是“易姓改号”，“亡国”之举；而满族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衽”，“亡天下”。此一时期，“亡国”与“亡天下”，兼而有之，与中国历史上宋元之际相似。对汉族士大夫来说，这种沉痛的历史记忆是难以抹去的。因此，他们本着“国可亡史不可灭”的学术传统下，勇于保存这一段历史。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段历史仅仅只是短暂的一瞬。不过，梁启超曾充分肯定地说：“明清鼎革之际一段历史，在全部中国史上实有重要意义。”^②而且，这短暂的历史瞬间，“反而在后世会激起回响，并且引发历史学家们不倦的探索兴味”^③。可以说，整个清代，乃至民国时期，南明史撰述与研究方兴未艾。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13“正始”条，黄汝成集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56~757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30页。

③ 朱维铮：《中文版序》，见司徒琳《南明史：1644—166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按：此文系朱维铮先生1990年12月作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高级学院，后收入《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名曰《南明史的一部力作》，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135页。

史学是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反映。特定的时代变迁和社会环境，总要反映到那一时代的史学风气上来。与这样特殊的时代相联系、或处于这个时代中的史学，富于多种特色，饱含多种精神。其中，以关注当代历史社会变迁、重视总结历史成败得失、弘扬民族气节、褒奖忠孝节烈为主要内容和学术旨趣的南明史撰述，是这一时期私家史学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具体来说，顺治至康熙中后期的南明史撰述，以遗民学者为主体，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具有较强的时代意义和经世意义。是中国古代史学上当时人如何处理封建王朝易代之际历史的突出代表之一。康熙中后期，遗民相继谢世，继之而起的南明史研究，呈现出两条途径：一则新朝出生的私家学者，在官方严厉的史学政策下，小心谨慎地继续于斯役。二则至乾隆中后期，官方关于南明史的政策逐渐松动，并以南明之史大做文章，以为现实政治服务。

自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明中央政权覆亡以后，纂注、撰写和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代有其人，相继不绝。或为躬于行伍的抗清志士及其子弟后裔，或为遗民学者，或为仕清官吏，或为文史大家，或为社会名流。其身份不同，记载各殊，褒贬不一，长短并见。加之南明史撰述宏富，体裁多样，或纪传，或编年，或纲目，或本末，或日记，或小说，或戏剧，或杂而有之，或稍有变通。无怪乎清朝著名学者全祖望称之为“明季野史，不下千家”。其中大部分以“存一代之旧物”（记录、选辑、汇编史料）的“记注”为主，也有一部分是“独断于一心”（有组织、有体例、有创见）的“撰述”^①；“两者本自相因而而不相妨害”^②。为便于行文，本书以“撰述”称之而不作细致的辨别。

清朝在稳固政权之后，实施了严厉的文化箝制政策。不仅大兴文字狱，株连无数，还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寓禁于修”，严重影响和扭曲了私史的正常发展和传播。以致其书凡涉明末清初史实，或遽遭禁毁，至今渺而无闻；或传抄流传，鲁鱼亥豕多有；或出于避忌，任意删改，以致前后割裂，不尽相同。甚者一书而有数名，作者更出伪托。就官方史学而言，康熙间清朝正式官修《明史》，中经六十载，始付武英殿刻版。其间，就南明这段特殊的历史在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仓修良新编新注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253页。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报黄大俞先生》，第633页。

整个明史中的地位及处理方法，参纂史官，意见旨趣既殊，但相互讨论，颇有发明。至乾隆中期，官方先后编纂《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钦定国史·贰臣传》及《逆臣传》等官修史书，对南明史进行了重新的审视、诠释、处理和定位，形成了新的官方南明史论断，从而成为清朝官方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究其目的，则是劝奖忠孝，加强教化，从而为其政治服务。这是史学服务于政治的突出表现之一，凸显出政治与史学密切联系的本质特征。

总的来说，与官方史学相比，私家的南明史撰述，是清朝南明史撰述的重心所在。但官、私双方之间，亦存在着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私家南明史撰述给官方《明史》修纂提供史料储备、参考借鉴等效用；另一方面，官修《明史》关于南明历史的阙略与不足，又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激发了当时学者对这段历史的搜讨和撰著。此外，官方史学政策及其举措，也对私家南明史撰述与研究，造成了较大的消极影响，带来了一些人为的限制。

二、近代以来“南明”一语的诠释及南明历史的划分

南明这段历史，在清代学者那里，常常有着不同的称谓。这既与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关，更与他们所持有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站在明朝立场上的遗民学者常以“本朝”“故国”等称之，而站在清朝立场或支持清朝的文人与仕清官吏，常常以“胜国”（与称呼本朝的“昭代”相对）“故明”“明季”“残明”“前朝”“南疆”诸语称之。“南明”一词的出现，实际上是在“南朝”一称之后。以“南朝”称呼南明，在清初学者那里，已经出现过几次。顺治七年（1650）钱肃润撰成《南忠记》，即以“南朝”称呼南京弘光政权。^①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孔尚任撰成《桃花扇》，亦称南京弘光政权为“南朝”^②。可见，以“南朝”称呼南明弘光政权，已经是清初学者较为认同的观念和习惯的称呼。原其本意，“南朝”则是“南京之明朝”，与此前被李自成农民军推翻的“北京之明朝”相对而言。据目前所见材料，“南明”

① 钱肃润：《南中纪·靖南侯黄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8~109页。末“钱子曰：敌渡江，南朝烈死事者，文臣唯史公一人，武臣唯黄公一人。”

② 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卷首《桃花扇小引》：“《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今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一救矣！”

一词，较早见诸康熙间陈鼎所撰《东林列传》一书。^①不过，陈鼎之称“南明”，有与“南宋”比类而言的特点。

据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所著录，清代最早以“南明”名书，用以记载明清之际这段特殊的历史，则始于道、咸间学者钱绮所撰《南明书》。^②因此，美国学者司徒琳在其《南明史：1644—1662·英文版序言》称：“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学者才使用‘南明’这一称谓。”她继续指出：“此词与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对其他朝代，尤其是对南宋的称谓一样，意味着对某些政权表示尊重，视其为正统，大多数清朝学者提及1644至1662年这段时期，总是称为明末、明季、南疆，或用前朝亡国的典故以为暗示。”^③在清朝帝制被推翻的前十余年，反清革命情绪随之而起，于是“南明”一词才被广泛使用。

南明历史与两晋之际、宋元之际相比，既有某些相似性，又有一定的特殊性。从时间上来说，现在公认的观点是，她“是群雄争霸，又是明朝的延续，又是清初历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④，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于这段历史的时间起迄和研究范围，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研治这段历史的学者，多有申说，兹胪列如下。

朱希祖撰《编纂南明史计画》称：

南明时代，指弘光、隆武、永历三朝而言。自崇祯十七年五月起至永历三十七年止（清顺治元年至康熙二十二年），约四十年。其间若鲁监国、郑延平王等事，亦包括在内。^⑤

① 陈鼎《东林列传》卷12《黄道周传》传末“外史氏曰”称：“嗟乎！明既亡矣，而先生犹踉跄以图恢复，不亦难乎？假使南渡以来，马、阮即死，而任先生以国，或者李纲、赵鼎庶几再见于南明，而社稷或可苟延于江左，奈何马、阮不死，又欲诛戮东林，期于斩草除根而后快？则先生危矣。至唐王再起已死之灰，焉能复燃乎？先生曰：‘一息尚存也，乌容已耶！’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其先生欤！”清康熙五十年（1711）售山山寿堂刻本。

②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77页。

③ [美]司徒琳：《南明史（1644—1662）·英文版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其尾注云：“卒于咸丰年间（1851—1861）的钱绮，据说著有《南明书》。参看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卷二。”

④ 顾诚：《南明史·序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⑤ 朱希祖：《编纂南明史计画》，原载《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2卷第7期，1931年。又，收入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38~341页。

普遍认为南明历史长达四十年，上起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五月，下迄永历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凡弘光、隆武、永历、鲁监国、明郑政权，皆包括在内。

谢国桢也勾画了南明史的大致轮廓：

当甲申乙酉以还，海内奋起，群情愤激，共起抗清，不忘故国，拥戴明裔，藉谋恢复。于是福王由崧即位南京，建号弘光；唐王聿键即位福州，建号隆武；桂王由榔即位肇庆，建号永历；鲁王以海监国绍兴，漂泊海岛；唐王聿錡起兵广州，建号绍武，为时最促。凡此数代，为继存明统，后世称之为南明，而清朝统治政权，则目之为五藩。其他若韩王本竝，为荆襄十三家军所拥立，据守巴东山中，建号定武，因僻在一隅，不为后世所注意，而历时最久，其被清廷翦除，反在永历之后。至于各方义旅，蹈汤赴火，英勇力争，若史可法之誓师江表，孙嘉绩之画江之役，大兴寨主王翊之四明结寨，六狂生华夏、屠献宸等等翻城之役，郑成功、张煌言之率师北伐，以及郑成功之攻克台湾，李定国之恢复西南，李来亨等之抗战巴东，东西相峙，清廷竭尽其力，始能镇定。若吴三桂等之反覆无常，至清康熙二十年辛酉（一六八一）为清兵所平，郑克塽聚兵台湾，至二十二年癸亥（一六八三）始入清廷版图。在外表观之，明祀似已告终，而蕲黄、四明之依岩结寨，山陬海涘之会社秘谋，所在多有。^①

谢国桢提出的南明历史的时间起讫，与朱希祖的说法，基本没有大的区别；研究内容以弘光、鲁监国、隆武、邵武、永历、定武等南明政权为主体，还兼顾了地方义旅抗清之举、秘密会社等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谢国桢撰成开创性的、比较系统翔实的南明史专著《南明史略》，^②于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梓行。此书“主要论述和评介了南明弘光、鲁王、隆武、绍武、永历诸政权的兴亡变迁，兼及荆襄巴东的农民起义、韩王政权和北方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③。

①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首《自序》，第3~4页。

② 参见拙文《谢国桢先生与南明史研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③ 谢国桢：《出版说明》，载《南明史略》书前，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

至 40 年代，柳亚子在《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经过》中这样概括南明史的大致范围：

所谓南明的范围，是从公元一六四四年即明历崇祯十七年甲申五月三日弘光帝监国南都起，到公元一六八三年即明历永历三十七年癸亥八月十三日汉奸施琅入东宁，延平幼王朱克塽出降为止，共计四十年。这四十年历史，正是汉人和鞑子斗争的历史。这四十年间统治汉族的代表者，是南明三帝和延平三王，还有一个旁生侧挺的鲁监国。^①

其说与朱、谢二说差别不大，但在时间起讫上具体到月份。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史学界先后出现了两部南明史著。南炳文据他与汤纲合撰的《明史》下册之南明史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整理重编为《南明史》一书，1992 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认为：

从清朝入关、李自成起义军撤出北京，到南明诸政权及与之合作农民起义军最后失败，凡历时四十年。这一时期的历史，就是所谓南明史。根据政治斗争形势的发展，南明史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644 年夏至 1645 年上半年；第二阶段为 1645 年下半年至 1646 年冬；第三阶段为 1646 年冬至 1651 年；第四阶段为 1652 至 1683 年。^②

顾诚所撰《南明史》，是一部系统的南明史著作，“一部将南明史研究推向新水平的佳作”^③。顾诚认为：

南明的历史在我国史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包括了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及随之而来的清兵进入山海关问鼎中原以来一直到康熙三年（1664）夔东抗清基地覆灭的各地反清运动的历史……称之为南明，是因为以崇祯皇

① 柳亚子：《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经过》，原载《大风半月刊》第 82 期新年特大号，1941 年 1 月 5 日。又，收入《南明史纲·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91~311 页。

② 南炳文：《南明史·引言》，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 页。

③ 陈梧桐：《一部将南明史研究推向新水平的佳作——评顾诚著〈南明史〉》，《历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

帝朱由检为首的在北京的明朝廷业已覆亡，这段时期的战斗主要在南方展开，又是在复兴明朝的旗帜下进行，而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但是，抗击清朝的暴虐统治，并不仅仅局限于南方，陕西、甘肃、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抗清运动连绵不断，波涛叠起，清廷统治者多次感到患生肘腋，不得不动用重兵围剿。这是就地域而言，南明史的覆盖面并不只限于南方。如果就时间来探讨，南明史的上限过去和现在的史学家大抵是以弘光朝廷在南京继续为标志，本书作者认为南明的历史应该从甲申三月十九日北京被大顺军攻克、崇祯朝廷覆亡开始。这是因为朝廷虽然覆亡，明朝政权仍然控制着江南半壁江山，尽管在具体时间上（即1644年三月至五月）相差不远，但我们应该着眼于全国形势的演变，而不能拘泥于南明帝王的继统。如果因为甲申三月十九日到同年五月初三日明朝统治区没有皇帝（或监国）而把这段时间排除在南明史以外，就会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弘光帝被俘在1645年五月，隆武帝继统在同年闰六月；隆武帝被擒杀在1646年八月，永历帝继统在同年十月，其间都有一两个月的帝位空缺。“国统”三绝不等于南明史三绝，这是稍加思索就能明白的道理。同样理由，南明史的下限不以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被俘杀告终，而以李来亨茅麓山战役结束。当然，把南明史的下限一直拉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进军台湾，郑克塽、刘国轩投降，也是一种认识和叙述的方法，因为郑氏家族在台湾始终奉行明朝永历正朔，虽然皇帝和朝廷早已不存在。^①

顾诚在南明史的时间断限在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大顺军攻陷北京之后至清康熙三年夔东地区抗清失败，并认为地域上不局限于南方，还包括陕、甘、晋、豫、晋、鲁等地的抗清运动，他并不否定康熙二十二年郑克塽降清作为南明史的下限之说。

合观各家之说，大致相同，亦有差别。一般来说，南明之史，大致包括明清之际在中国南方相继而起的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与绍武、定武等南明

^① 顾诚：《南明史·序论》，第1~2页。

政权，以及南方人民大众的抗清运动史事。这是目前所认可的南明历史的大致范围。此外，发生在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1683—1681）的“三藩之乱”，虽与“明清之际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密切关联”，顾诚认为“把三藩之变同南明史扯在一起毕竟不大合适”。诚然，就现代人的南明史的撰写来说，这种断限，固然确有其道理，但对于清朝南明史撰述来说，三藩变乱的参与者，反映了明清鼎革以来的社会变迁运动，也与后来乾隆朝先后继起的史学活动，有着较为直接的联系。所以，现今纯粹的南明史研究，对此可以有其断限和取舍，而作为清朝南明史撰述研究，是无法撇开这一方面来探讨相关问题的。

三、清朝南明史撰述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自 20 世纪以来，关于清朝南明史撰述的考察，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回顾百年的清朝南明史撰述研究前史，我们不难发现，关于这一专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清末及民国时期，其特点是注重对南明史籍的搜求、整理和解题。第二阶段为新中国成立至十年“文革”结束，其特点是在前期研究之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第三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对于清朝南明史撰述的研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涌现出许多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这里，我们按照这一分期方法，对三个阶段的清朝南明史撰述研究状况作一些分析。

（一）清末及民国时期：南明史籍的搜求、整理与解题

晚清以前，南明史撰述与研究，一直被视为学术研究的禁区之一。从晚清时期开始，随着文禁的渐弛，传统史学家多留心于南明史及著述的研究，更多注意于曾经复壁深藏的南明史籍的搜罗和整理工作，如傅以礼著《华延年室题跋》、李慈铭著《越缦堂读书记》等，都是重要的代表作。

一般来说，百年前的南明史及史籍研究，是与清末民初鼓吹革命、倡导反清的时代风气密切相联的。清末较早从事晚明史籍的搜集和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国粹派的代表人物，如邓实、黄节、陈去病、章太炎等。他们在自己的学术阵地《国粹学报》上，不仅刊发了大量富有民族气节的南明人物传记，还搜集整理抗清志士遗集及南明史籍，刻入《国粹丛书》《神州国光集》等刊物，并为之作序、跋，如陈去病撰《敬修堂钓业序》《吴长兴伯遗集序》（俱载《国粹学报》第 11 期，1905 年），邓实撰《黄梨洲行朝录后叙》（《国粹学报》第 20

期, 1906年)、《留都见闻录跋》与《张文烈遗诗跋》(俱载《国粹学报》第36期, 1907年), 黄节撰《甲申传信录跋》(《国粹学报》第21期, 1906年), 戴角撰《南疆逸史跋》(《国粹学报》第34期, 1907年), 等等。此外, 他们还还为研究或撰写南明史的学者写传记, 如刘光汉撰《全祖望传》(《国粹学报》第11期, 1905年), 黄节撰《李世熊传》(《国粹学报》第44期, 1908年)等, 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1906年, 章炳麟出狱后来到日本, 热衷于搜集、整理并翻印明末清初抗清志士的诗文集。据朱希祖所述, “余自二十五年前游学日本, 初留意晚明史籍, 其时二三师友, 亦尝弘奖斯风。余杭章先生首先传刻张煌言《苍水集》、张斐《莽苍园文稿余》。……盖读此等书者, 皆有故国河山之感, 故能不数年间, 光复旧物, 弘我新猷”^①。可见, 南明史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 成为当时宣传排满革命、激扬民族气节、抒发民族情怀的工具和手段。朱希祖在其师章炳麟的影响下, 始“留意于晚明史籍”, 并以南明史作为其研究的重要领地之一。因此, 在这一时代风气的侵染下, 南明史籍整理和研究, 一度成为清末民初一股新的学术热潮。

当时从事于南明史研究的学者, 除朱希祖外, 还有谢国桢、柳亚子等人。他们都是民国时期从事南明史研究的重要代表。总的来说, 这一时期的清朝南明史撰述研究, 以搜集、整理和研究南明史籍, 并撰写题跋、提要、按语为主要特征。

朱希祖致力于南明史研究, 长达三十余年, 尤为注意广搜博采南明史籍。朱氏自称: “三十年来蒐访南明史料约二百数十种, 南明诗文集约百五六十种, 笔记、杂著约数十种。”^②统计下来, 已有400余种, 但并不是最终书目。据有人统计, 朱希祖所收包含南明资料的史籍, 包括野史、杂著、南明人年谱、文集、方志、政书等, 不下700种。其间, 更有旧钞珍本、海内孤本之书, 如吴钟峦《十愿斋全集》, 清康熙初年刻本; 张家玉《名山集》, 南明弘光刻本。因此, 他对南明史籍的收藏和研究, 在当时就有“全国公私第一”的称号。^③同时, 他特别注意对所搜南明史籍作精细的校勘考订工作, 并以题跋这种传统的

① 朱希祖:《晚明史籍考序》,载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8~1100页。
② 朱希祖:《编纂南明史计画》,原载《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2卷第7期,1931年。又,收入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38~341页。
③ 参见李培文:《朱希祖与郟亭藏书》,《江苏图书馆学报》2001年第5期。

学术研究形式，对南明史籍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形成了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有人辑录整理成为《明季史料题跋》一书，并于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综合来看，他的这些题跋，多写于1927至1933年。其中最早的是写于1925年12月9日的《跋旧钞本明熹宗实录》，最晚的是写于1937年2月6日《南渡录跋二》。其撰写时间前后长达十余年之久。这些题跋多数是就南明史籍的作者、卷帙、藏地、版本、源流等而展开。如考订作者：《弘光实录钞跋》，考定其作者为黄宗羲；《校钞本思文大纪跋》，考定其作者为陈燕翼；《旧钞本守麋纪略跋》，考定其作者为高斗枢。如考订版本：《南渡录跋》，考定此书系顺治中刊本；《钞本甲乙事案跋》，考定此书为乾嘉间钞本。又如考订与史籍相关之史实：《校本岭海焚余跋》，考定此书原名或为《行都奏议》，或以避禁而易名；《旧钞本恻余杂记跋》，考定《恻余杂记》原为清朝禁毁之书，因其记载清朝圈田之令，藏匿东人、满人、放债之事，以及全书称清为“奴”与“虏”；《钞本甲乙事案跋》，考定《甲乙事案》为禁书，时人传钞，或为避祸，或为谋利，而题为“昆山遗民亭林氏顾炎武著”“昆山亭林氏顾炎武撰”（道光间活字本《荆驼逸史》）；《劫灰录跋》，考定《劫灰录》系冯甦《见闻随笔》的下卷，专取其记载西南往事之部分；《四朝成仁录跋》，考定《四朝成仁录》为屈大均的未竟之作。同时，还有指评著者思想的进步或落后之处。如《跋旧钞本幸存录》，称夏允彝持论公允，“观此录《门户杂志》，于齐、楚、浙三党皆有恕辞有贬辞；于马士英亦有恕辞有贬辞；谓东林杂而偏，不尽公忠；又谓东林诸贤过激，遂致天下左衽；又谓徐石麟、刘宗周、侯峒曾、徐汧、黄淳耀殉难于家，不可以其东林也而私诋之；若其臣虏臣寇，如钱谦益、李建泰，自不得以其东林也而恕之；又如张捷、杨维垣之死难，不得以其攻东林而少之；如蔡亦琛、唐世济、邹之麟、张叔振、陈于鼎、刘光斗辈之失节，亦不得以其攻东林也而恕之：此皆持平之论”。《弘光实录跋》，指出其作者黄宗羲，作为明末东林、复社中人，作史论史，往往带有偏见，称黄宗羲对“圣安及马、阮，颇多怨愤之词，深刻之语”；又在《跋旧钞本幸存录》中，进一步指出黄宗羲出于门户之见，深诋其书，专作《汰存录》以辨斥，指为“不幸存录”，认为黄说为“党见不同之波辞也”。朱希祖的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今天继续探讨清朝南明史

撰述这一课题，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故有人推之为“南明史研究的拓荒之作”^①！

谢国桢是国内知名的明清史专家。他的《晚明史籍考》二十卷^②，早在1932年就由北平图书馆铅印出版。后屡有扩增，多达二十四卷。该书搜集明末清初的野史稗乘及有关明季史事的文集、奏议，数量繁多，分类详审，是迄今为止有关明末清初史籍搜罗最全的书目汇考，也是我们今天从事明末清初史学研究工作的必备参考用书。对于它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早有学者认定为“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这部书，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③。今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增订晚明史籍考》统计，从卷八到卷二十三，多为与南明史相关的资料。因此，我们可以按图索籍。此外，他也撰有为数不少的南明史籍题跋，如《耐岩考史录跋》（《学文》第1卷第2期，1931年1月）、《荆驼逸史跋》（《学文》第1卷第5期，1932年5月）。

柳亚子是富有爱国精神的民主人士。为撰著南明史，他广搜博采南明文献，倾注了充足的热情，耗费大量的精力。所见南明史著不下百种，其中多有海内孤本。他曾经谦虚地说，他所作的南明人物传，“可以算是研究南明史料的副产物”^④。他对南明史著的研究和见解，散见于他的几篇文章中，如《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经过》（《大风》第82期新年特大号，1941年1月）、《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笔谈》第7期，1941年11月）、《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文学创作》第1卷第3期，1942年10月）、《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文学创作》第1卷第4期，1942年12月）、《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文学创作》第2卷第1期，1943年3月）及相关的南明史料序跋。^⑤尤其是《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著录所见的南明史著，多达120余种，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① 姜胜利、王爱卫：《朱希祖与〈明季史料题跋〉》，《华侨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② 按：谢国桢《晚明史籍考》，1932年初版时为20卷。后屡有增补，至1964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再版时，已扩至24卷，题为《增订晚明史籍考》。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原中华书局上海版再版。此外，又有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1932年版《晚明史籍考》。

③ 柳亚子：《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文学创作》第1卷第4期，1942年12月。

④ 柳亚子：《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经过》，原载《大风》第82期新年特大号，1941年1月。

⑤ 以上诸文，后收入《南明史纲·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362页。

此外,还有一些题跋值得注意。如牟传楷《晚明史籍跋文三则》(《燕大月刊》第6卷第3期,1930年10月)、柳诒征《季明封爵表跋》(《国风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33年6月)、陈叔陶《南明野史跋》(《出版周刊》新220号,1937年2月)、李光璧《清圣祖招降十三家军残诏跋》(《中国公论》第6卷第3期,1941年12月)、王之屏《跋永历帝致吴三桂书(附论洪承畴解职之经过)》(《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3集,1943年8月)、郑振铎《跋五十六卷本“南疆逸史”》(《青年界》新1卷第2期,1946年2月),等等。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南明史籍研究,多注重从文献学角度对相关著作进行探隐钩稽,整理分类,并以传统学术形式写出相应的题跋、按语、提要等;不仅有助于澄清以往认识中的一些模糊甚至错误认识,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进一步研究,可以起到按图索籍、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外,对重要学者暨南明史家的著述作整体考察,进行大范围的梳理和考订,是这一时期清朝南明史撰述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如谢国桢《彭茗斋先生著述考》(《北平图书馆月刊》第3卷第1期,1929年7月)^①一文,不仅广泛搜集了彭孙贻传记,而且还对彭氏的二十余种著述,如《平寇志》(一名《流寇志》)、《山中闻见录》、《明朝纪事本末补编》、《甲申以后亡臣表》、《茗斋集》等,进行了详细著录和解题。当时,著名历史文献学家赵万里称“此考之搜辑之广且勤也”。朱希祖《屈大均(翁山)著述考》(《文史杂志》第2卷第7、8期,1942年)^②一文,认为“屈氏著述,大半有关乎南明史实,不特《皇明四朝成仁录》之大有裨于史也,即其诗文亦然”。并将屈氏可考著述,按传统文献分类法编排,其中列入史部、有关南明史实者,有《皇明四朝成仁录》(今存)、《永历遗臣录》(未见)、《安龙逸史》(托名)、《南渡剩篋》(托名)等。又如王重民《李清著述考》(《图书馆学季刊》第2卷第3期,1928年9月)^③以及蒋天枢《全谢山先生著述考》(《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第1、2号,1933年1—4月),等等,皆属此类。

(二) 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年: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清朝南明史撰述研究

① 又附入谢国桢:《黄梨洲学谱》,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明清笔记谈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后收入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8册附录之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6~2163页。

③ 后收入王重民:《冷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210页。

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确立，清朝南明史撰述研究多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继承前期解题考辨特色之同时，开始着意于重要史家及其史学成就的研究和分析，以及新发现史料的研究。

第一，继续注重南明史籍的整理、研究和考辨。

郑成功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是这一时期的大事。1961年5月，厦门大学成立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以整理郑成功历史资料和调查郑成功史迹。^①次年2月，在厦门召开了“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提交的32篇论文中，谢国桢《有关郑成功史乘辑录》、庄为玑《郑成功四种原始史料的比较研究》（俱载《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均是从文献角度进行研究的代表作。谢文在《晚明史籍考》的基础上，又增入了经过调查研究的新获资料和国外译著，共80余种，分为六类：台湾郑氏所撰诸书、明末清初人士对于台湾郑氏之记载、清朝官书及清人之记载、近人记台湾郑氏之书、日本荷兰等国记载台湾郑氏之书及记台湾郑氏未见诸书。庄文认为“和郑成功同时代活动的人物直接记录下来的史料”，是最重要的中文史料，如《从征实录》（一名《海上实录》）、《闽海纪要》（原名《海纪辑要》）、《海上闻见录》以及《台湾外纪》四种史料；并就其原名、作者、内容诸问题及四书之间的内在联系作比较研究。

《明季史料题跋》出版后，陈恭禄撰《〈弘光实录钞〉的作者及其史料价值》（《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3、4期），认为朱希祖虽考定《弘光实录钞》为黄宗羲所作，但所据多有不足，并据原书找到三类本证材料：（1）“臣父黄忠端”等直接证据；（2）黄氏与刘宗周亲密的师徒关系；（3）黄氏写作的兴趣和习惯。他指出此书以邸报为主，辅以旧闻，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然其不足在于黄氏憎恨“逆党”，于书中不自觉地流露出一己之见。张宗洽《〈郑成功传〉不是黄宗羲写的》（《人民日报》1964年10月23日）从叙事立场、所记事实与《赐姓本末》矛盾等方面，证明此书非黄氏所著；又称所见蕙葭堂版《国姓爷郑成功传》与《梨洲遗著汇刊》本《郑成功传》文字完全一样，而断为郑亦邹所撰。夏定域《〈明季史料题跋〉补正——有关明

^①《厦门大学成立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整理郑成功历史资料及调查郑成功史迹》，《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